

# “以权择校”：父母政治资本与子女择校

叶晓阳\*

**摘要** 本文将党员身份和科级以上干部身份作为政治资本的代理,利用CGSS 2003数据对我国城镇地区“以权择校”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父母政治资本显著提高了子女择校的的概率,更高的政治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子女的择校费支出,具有更高政治资本的人具有更消极的公共教育态度,但是具有更高政治资本并用于子女择校的父母则没有显著的消极态度。同时,本文还得到了党员作为政治资本的异质性以及隔代影响的证据。

**关键词** 择校 政治资本 党员 CGSS

## 一、引言

在对教育公平的讨论中,择校问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与发达国家出于对公立学校质量和效率的质疑以及对市场竞争的推崇,而支持倡导公立学校之间的选择和私立学校之间的选择不同(Levin, 2001),中国特色的择校问题主要源于重点学校制度。“在90年代以来教育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差距呈不断拉大之势。少数重点学校与多数普通学校、薄弱学校并存的客观现实,造成学生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重点学校赖以‘寻租’的筹码是升学率,升学率越高,重点学校的名气和价码就越大。应试教育与择校竞争因此互为表里、相互推进,结成坚固的利益同盟。”(杨东平, 2009)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认为,学校选择可以使公立学校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其生产效率(Hoxby, 2003),以及降低校内学生同质性,有利于弱势群体(Glewwe, 1997)。我国义务教育实行就近入学政策,则旨在实现教育起点的公平。在我国的城镇地区,义务教育实行学校划片、就近入学,在学校质量差距较大的地区,多实行“电脑派位”的做法。《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政府则“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招‘择校生’”。

然而,在我国基础教育学校间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弱势学校过度分层的现实基础上,近年来重点学校吸引各种社会资源开办民办分校,“公办民助”和“公助民办”的形式成为学校应对政府政策的新对策,即通过民办资源来收取相关的捐资助学费的,把学

\* 叶晓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E-mail: yxiin17@gmail.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邮政编码:100871。作者感谢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和北京大学王蓉教授对本文的批评和指正。感谢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研究(CGSS)项目提供本文的全部数据。本文曾在2011年中国经济学年会和2011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上报告过,感谢参会者的讨论和意见。特别感谢匿名评审细致而宝贵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生安排在民办分校里。同时,在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阶段,政府以“三限”政策(限分数、限人数和限钱数)允许择校的存在。这些都使得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现象普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以权择校”、“以钱择校”<sup>①</sup>,只能增加强者的选择,剥夺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破坏教育公平,甚至是一种教育领域的腐败和寻租(文东茅,2006)。

其中,“以权择校”依托家庭的政治资本,将子女安排到优质的学校就读,是一种凭借政治权力攫取社会稀缺教育资源、严重破坏教育公平的现象。但是“以权择校”是一种隐性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不易为人识别。本文将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作为政治资本,利用200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03)对城镇地区的“以权择校”进行实证研究<sup>②</sup>,分析父母政治资本是否影响子女的择校,以及父母的政治资本是否降低其择校费用。进一步地,我们还将讨论拥有较高政治资本的人对于公共教育投入的态度是怎样的。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给出数据的描述统计,第四部分讨论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概率的影响,第五部分是讨论父母政治资本对择校费支出的影响,第六部分考察父母的公共教育态度,最后是小结。

## 二、文献综述

对政治资本作用的研究是市场转型文献中的重要内容。边燕杰、吴晓刚和李路路(2008)在对中国转型研究的展望中总结说,目前对政治资本的含义和测量指标并没有达成共识,“政治资本指政党和政权所提供的身份、权力、资源以及由此而来的威慑力、影响力,所以研究中设计的指标包括党员、干部职位、前干部身份”。

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最常见的政治资本代理变量是共产党员身份。研究者们主要讨论了政治资本对收入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党员身份可以增加收入(参见 Xie and Hannum,1996; Liu,2003; 张爽等,2007; 李爽等,2008; 陈钊等,2009)。也有研究认为党员身份并不能增加个人收入,早在1989年倪志伟(Nee,1989)就提出,市场导向的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尽管他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干部收入随市场改革的深入而上升,对此他解释说,干部的经济优势丧失是相对的,而当干部身兼企业主的时候,其收入高于普通人(Nee,1996)。Morduch and Sicular(2000)的研究同样认为党员身份不能增加收入。Li et al.(2007)运用中国的数据,在控制了双胞胎的固定效应过后,发现党员身份对个人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他们的研究并没有辨明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收入的影响,而杨瑞龙等(2010)通过父母退休的外生事件确认了“父母政治身份-父母政治关系-子女收入”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亲在职和党员的交互项对子女收入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显然,这样的分歧并非来源于政治资本的作用本身,不论从直觉上来说,还是研究的共识,党员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享有优势的。但是在实证研究中,我们还需要厘清政

① 通常来说,择校有“以分择校”、“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三种。在义务教育阶段,尽管取消了统一的小升初考试,但是学校自行组织的各种选拔考试仍然存在,相对来说,“以分择校”是一种较为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

② CGSS 2003 只进行了城镇地区的调查,事实上择校问题也是在城镇地区体现得更突出。

治资本与个人收益之间的关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社会学家多将政治资本(如党员身份)视作社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如 Xie and Hannum, 1996),而经济学家多将其视作政治资本,更有学者如 Mincer、Heckman 等又将政治资本当作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参见刘和旺和王宇锋 2010)。但是,正如李博柏和 Walder(2001)指出,党员身份和精英职位之间的强相关被精英的筛选过程所掩盖,尽管党员身份本身就是政治资本,党员所享有的资源分配优势不是党员身份本身就能带来的。本文在中国的转型背景下,增加行政级别作为政治资本的度量,能够进一步细致地观察党员身份的优势何在。

在对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的影响的观察中,我们需要界定清楚政治资本的作用机制。刘和旺和王宇锋(2010)认为政治资本的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1)党员身份类似于人力资本理论的信号功能,是能力或其他个人品质的信号(Li and Walder 2001);(2)政治资本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在社会关系网中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用以个人职业生涯晋升等,党员身份带来社会网络作用;(3)在经济转型时期,党员干部可能借助政治权力寻租,为自身和家庭谋求利益,这体现为区别于普通人的党员的权力作用。在对政治资本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并没有明确区分政治资本的网络作用和权力作用,而较多地关注党员的政治资本是否被用于权力寻租,但实际上,在中国,党员身份并不代表政治权力,干部身份才是政治权力更好的代理变量<sup>①</sup>。

而在对择校问题的研究中,国内外的研究者对择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一般从个人(学生的性别、民族、省份、学校与成绩等)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户口、家庭收入)两个方面考察个人择校的影响因素。

文东茅(2006)利用2004年“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的数据,讨论了家庭背景对择校行为的影响,主要从父亲学历、父亲职业、家庭人均收入和本人户口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弱势群体受经济能力、社会关系、户口政策等限制,在择校竞争中同样处于弱势。李芳(2008)在对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现状进行分析的时候将择校细致地划分为“是否择校”、“选择哪所学校”和“择校是否成功”三个方面,其中家长的社会资源(人情网,“条子”和“面子”)和家庭经济条件(“票子”)以及北京户口起到重要的影响。杨钊(2009)在考察“三限”政策对公立高中择校的影响的时候,认为近年来的择校政策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高社会经济背景的择校。王东(2010)讨论了“两为主”政策背景下流动儿童家长的择校行为,也发现家长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得流动儿童仍然选择留在教育质量较差的打工子弟学校。来自国外的研究同样证实了这个结论,Hsieh 和 Urquiola(2003)对智利教育券计划的研究发现,来自经济情况较好的家庭的学生在获得择校机会时更有可能离开原有的公立学校而进入私立学校,而那些来自于弱势家庭的学生则只有留在公立学校。

上述研究笼统地讨论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择校的影响,并没有明确地研究父母的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的影响机制,事实上,研究政治资本在择校中作用的文献较为少见。钟奉和樊雪志(2007)利用2005年“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的数据,使用二元 Logit 模型分析了城镇学生择校的影响因素,他们较早地开始考察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

<sup>①</sup> 在中国,官方宣布拥有超过8000万党员,而公务员的数量不超过700万。

引入了“父母至少一个是干部”的解释变量,研究发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干部家庭的子女择校机会的发生比(log odds)是非干部家庭子女的1.45倍。

周群力与陆铭(2009)创造性地研究了拜年与择校之间的影响机制,他们认为在拜年的过程中,家长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政治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然后社会资本又通过择校向子女的人力资本转化,更高的家庭收入、父母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均增加了给中小学教师拜年的概率,而由拜年形成的关系网络又增加了子女择校的机会。韩莉(Li Han 2008)的研究可以视作政治资本在择校中作用的一个佐证,她认为党员身份的溢价主要体现在公共部门。

在对“以权择校”实证研究中,本文着重关注的是父母政治资本在子女择校上的寻租作用,以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作为代理的父母的政治资本对子女的基础教育阶段择校有什么影响。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现象,同时这也是从实证材料上丰富我们对政治资本作用机制的认识。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几个研究假设。

假设1:择校概率与父母政治资本正相关,父母拥有越高的政治资本,子女越倾向于择校,尤其是基于获取更优质教育资源的理由选择更好学校的择校。

假设2:父母的政治资本能够降低子女的择校费用。

假设3:拥有更高政治资本的家长对公共教育的态度越消极。

事实上,假设1是“以权择校”最基本的内容,家庭依托政治资本,将子女安排到更好的学校就读。由于数据原因,在没有控制学生成绩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观察到那些来自更高政治资本家庭的子女是否已经进入到好学校而不需要择校了,因此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假设1有可能不成立。我们还控制了一些关于子女教育的变量,将父母和祖父一辈的受教育年限作为家庭人力资本引入模型,认为家庭人力资本越高,择校概率则越低。

我们假定家庭收入越高的学生,为了上更好学校而择校的的概率就越大。由于择校费的决定是由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拥有更高政治资本的家庭选择的学校可能要求更高的择校费,尽管政治资本可能降低实际缴纳的择校费,但从平均数来看数额可能仍然偏高,假设2在统计上并不一定显著。需要解决自我选择偏差的问题。

假设3源自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教育被视作向弱势群体的再分配行为(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Deacon(2003)认为,精英阶层掌握了国家大多数的资源,但其却是少数阶级,如果提供公共品,精英阶层只能享受公共品提供的一小部分,成本大于收益,他们倾向于减少公共品提供,我们将通过实证数据来检验这一假设。

### 三、数据与描述统计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3年中国城市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3)<sup>①</sup>。我们主要使用其中的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情况部分有家庭直系亲属上学及择校的统计资料;根

<sup>①</sup> CGSS 2003 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持,调查只包括城镇,共涉及了125个县级单位、559个居委会、5900名被访者,收回有效数据5894条,数据于2007年发布。

据个人情况和社会交往构建其政治资本;在行为与认同部分,有针对性教育态度的调查。

与周群力和陆铭(2009)对数据的处理不同,本文需要识别出父母的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的影响,笼统地使用所有数据将导致估计偏误,需要将子女的个人特征与父母特征相匹配。本文采用了相对简单的数据清理方法,选择了家庭里有子女在上学且受访人为父亲或者母亲的样本,同时为了排除受访人为祖父母辈的情况,我们删除了子女出生日期在1970年之前的样本,经过删截过后还剩下2867份有效数据<sup>①</sup>。相应地,本文对部分数据进行了整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2002年收入对数	2726	9.533	0.976	5.298	13.592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	2867	10.232	3.062	0	19
受访人性别(0=男性)	2867	0.512	0.500	0	1
受访者是否党员	2822	0.189	0.391	0	1
受访者党龄	518	16.427	10.515	1	47
受访者是否农转非	2695	0.319	0.466	0	1
受访者是否上过党校	2820	0.079	0.270	0	1
受访者科级以上干部	2867	0.075	0.263	0	1
受访者配偶是否党员	2778	0.185	0.388	0	1
受访者父亲是否党员	2783	0.278	0.448	0	1
受访者父亲受教育年限	2764	6.213	4.577	0	16
受访者子女是否独生子女	2866	0.813	0.390	0	1
受访者子女是否少数民族	2864	0.074	0.262	0	1

本文将受访人与其子女的特征进行配对,受访人可能是父亲或者母亲,因此在所有父母变量中均指受访人的情况。根据惯例,按受访者回报的受教育程度换算为受教育年限,夫妻的受教育年限显著正相关(Pearson系数=0.513,  $p < 0.001$ )<sup>②</sup>,因此未对父亲和母亲作分别处理对实证分析影响较小,在后面部分我们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我们将收入数据“无填答/不知道”的样本(约占样本总数的6%)和收入为0的样本(约占样本总数的1%)命名为缺失值。限于分析重点,本文不具体分析多子女家庭的择校差异,由于控制了相同的家庭和择校特征,具体是哪一个子女择校不影响结果<sup>③</sup>,当然,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这一代人中超过80%是独生子女。

① CGSS 2003的受访人是随机挑选家庭里18—69周岁的住户成员,对于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而言,受访人可能是子女、父母和祖父母三辈中的某个人,相应的数据则需要配对。一个能使用大部分数据信息但是较为复杂的调整方法是将受访人为子女的样本中的受访人特征与受访人为父母的样本的子女特征以及受访人为祖父母的样本中的孙子女特征相配对。

② 李煜(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婚姻的教育匹配的同质性上升迅速,并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参见李煜《婚姻的教育匹配:50年来的变迁》,《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3期。

③ 如罗凯、周黎安(2010)讨论子女出生顺序和性别差异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认为子女越晚出生,其受教育程度平均越高;在农村地区,出生顺序效应显著为正,且男孩平均效应大于女孩,而这些现象在城镇地区均不显著。参见罗凯、周黎安《子女出生顺序和性别差异对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一个基于家庭经济学视角的分析》,《经济科学》2010年第3期。

本文主要使用受访人的党员身份<sup>①</sup>作为其政治资本的代理,同时还引入了党龄(受明瑟收入方程的启发,引入党龄的平方项)、是否参加过党校的培训,通过对受访人的历次工作情况的考察,发现超过90%的受访人无行政级别(与接受过党校培训的比例相当),我们控制了历次工作中拥有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身份虚拟变量。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还引入了受访人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和政治状况,并发现在中国城镇地区,政治资本的隔代影响是存在的,祖父辈的政治资本显著增加了孙辈的择校概率<sup>②</sup>。家长受教育年限平均约为10年,相当于高一水平,这与周群力和陆铭(2009)使用全体数据的估算是一致的,祖父一辈的受教育年限约为6年,相当于小学水平。约19%的家长是党员,平均党龄16年。

CGSS 2003详细调查了受访人家庭每次择校的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中约有21%的学生在过去十年里有过择校。除去“其他原因”(占46%),过去十年里,择校的仍然主要是“为了上更好的学校”(占40%),平均择校费约5000元。择校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

表2 子女择校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频数	比例
子女择校		
否	2 277	78.6
是	619	21.4
	2 867	100
择校原因		
未通过升学考试	60	10.2
去更好的学校	235	39.9
父母工作调动	17	2.9
其他	277	47
	589	100
择校阶段		
小学	231	40.2
初中	187	32.5
高中	157	27.3
	575	100
择校类型		
重点学校	226	38.6
私立学校	37	6.3
普通学校	323	55.1
	586	100

注:只统计了第一次择校的数据。

- ① 整理过后的样本中民主党派人士只有5个人,略去对其的分析,只对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进行比较。
- ② 只研究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的影响是有局限的,从直觉上来说,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的社会关系网内的资源都有助于子女的择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祖父辈的政治资本是否并不直接对孙辈择校产生影响,而是通过父辈的政治资本进行影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在后文我们将祖父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视作父辈的工具变量,检验了祖父辈政治资本的隔代影响。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在有择校的家庭中,超过76%的只有一次择校,因此在后面的分析我们主要采用第一次择校的情况进行分析是有代表性的。粗略地看,择校选择去普通的学校的更多,但是列联表结果显示,那些“为了上更好的学校”的人更多去了“重点学校”,而去“普通学校”的大多是“其他原因”,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资料,这里无法对“其他原因”进行详细的描述,而去私立学校的较少,这与调查区间(1994—2003)我国优质的私立教育资源仍然缺乏有关。加上“未通过升学考试”者择校同样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从描述统计的结果来看,城镇地区的择校有如下特征: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通常是选择更好的学校。

本文关心的是,拥有党员身份的父母对其子女的择校选择是否与非党员家庭不同。我们对择校动机和学校类型做相应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父母的党员身份在子女择校的动机和学校类型在10%的水平上都有优势,而父母的行政级别在子女选择重点的学校的时候有显著的优势( $p < 0.01$ )。当然卡方检验只是基于数据分布的检验,父母的政治资本对于子女择校是否有影响以及怎样影响,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 四、政治资本与择校概率

我们首先关心的是,父母的政治资本是否影响子女的择校概率?择校的结果是一个由0/1构成的二元因变量,我们采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基本回归方程为:

$$\log\{Pr(\text{schoolchoice} = 1) / [1 - Pr(\text{schoolchoice} = 1)]\} = \alpha + \beta X \quad (1)$$

其中,  $\text{schoolchoice} = 1$  表示过去十年里受访者子女有过择校行为,解释变量  $X$  表示我们关心的一些变量,其中包括父母的政治资本变量、家庭社会经济特征(收入、是否农转非等)、子女特征(如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少数民族等)以及祖父的政治资本变量。我们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进行敏感度分析。在Logit 1模型中,主要是父母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变量,Logit 2模型增加了人口学变量和地区分层,在Logit 3模型中引入祖父的政治资本、父母干部身份以及与党员交互项,Logit 4模型引入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干部身份和党员身份的交互项。结果见表3。

表3 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概率的影响(Logit Model)

	因变量: 是否择校			
	Logit 1 (MLE)	Logit 2 (MLE)	Logit 3 (MLE)	Logit 4 (MLE)
常数项	-3.714***	-3.084***	-2.789***	-3.167***
	.515	.569	.591	.584
父母党员(1 = 是)	-.660*	-.613*	-.675*	.054
	.345	.353	.357	.833
父母党龄	.092**	.078*	.074*	.072*
	.040	.042	.042	.042
父母党龄平方	-.003**	-.002**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续表

	因变量: 是否择校			
	Logit 1 ( MLE)	Logit 2 ( MLE)	Logit 3 ( MLE)	Logit 4 ( MLE)
父母党校培训(1 = 是)	.193	.271	.233	.243
	.197	.206	.211	.211
家庭 2002 年收入对数	.221 ***	.151 **	.152 **	.152 **
	.055	.060	.061	.061
父母受教育年限	.033 *	.036 *	.037 *	.047 **
	.019	.021	.021	.023
父母农转非(1 = 是)	-.284 **	-.250 **	-.254 **	-.264 **
	.112	.119	.119	.120
独生子女(1 = 是)		-.342 **	-.346 **	-.355 **
		.142	.142	.142
少数民族(1 = 是)		-.270	-.273	-.279
		.215	.215	.216
受访人为男性(1 = 是)		.149	.146	.146
		.106	.106	.106
祖父党员(1 = 是)		.344 ***	.342 ***	.344 ***
		.115	.116	.115
祖父受教育年限		-.024 **	-.024 *	-.025 **
		.012	.012	.012
父母干部身份(1 = 是)			-.435	-1.319
			.388	1.429
父母干部身份与党员交互项			.772 *	.958 **
			.454	.473
父母干部身份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				.064
				.103
父母党员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				-.100
				.063
县城相对于乡镇		-.054	-.056	-.054
		.187	.187	.187
地级市相对于乡镇		.340 *	.345 *	.349 *
		.182	.182	.182
省城相对于乡镇		.480 ***	.482 ***	.484 ***
		.179	.179	0.179
obs	2 494	2 379	2 379	2 379
df	7	15	17	19
LR chi2	43.94	67.32	70.59	73.09
拟 R <sup>2</sup>	0.0172	0.0279	0.0292	0.0303

注: \*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我们发现,与非党员相比,以党员身份和党龄作为代理的父母的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的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Logit 1 和 Logit 2 的结果),党员虚拟变量的系数为

负,这是控制了党龄的缘故<sup>①</sup>,考虑到样本中受访人的平均党龄约为16年,以Logit 2为例计算,党员家庭的子女择校概率比非党员家庭的子女高53%<sup>②</sup>,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父母的政治资本对子女的择校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考虑到李博柏和Walder(2001)提出的在党员群体中的进一步筛选问题,我们引入了是否参加党校培训虚拟变量。在现行的党内干部培训和提拔机制中,党校培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回归结果并不显著,然而系数为正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接受了党校培训的父母政治资本在子女择校上的优势。

与人力资本理论中工作年限对工资的作用相似,党龄对择校的影响也是一条向下拱的曲线,这可能基于两种影响机制:一是在入党若干年后达到一定行政岗位的级别,而在退休后这种政治资本的作用下降;二是在入党若干年后子女进入需要择校的阶段,因而具有较高的择校概率。回归结果是显著的,而且符合我们的假设。根据Logit 2模型计算出,子女择校概率最高的入党年数约为20年。

党员的政治资本异质性不只体现在入党年限上。党员身份并不必然构成政治权力,一定行政级别的干部身份显然暗示了更直接的政治权力<sup>③</sup>。我们在Logit 3中将父母的干部身份加入模型,发现其系数为负,统计上并不显著。我们再加入干部身份与党员交互项过后,系数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党员中当上了干部的人,其子女有更大的概率去择校,在同时控制了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作为政治资本的代理变量后,我们可以认为党员身份更多体现了政治资本的社会网络作用,而干部身份则直接体现了政治资本的权力作用。此时干部身份的系数仍然为负,不显著,说明在非党员中干部和非干部子女的择校概率没有显著差别。进一步地,我们在Logit 4还控制了父母受教育年限分别与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的交互项,统计上并不显著,受教育年限与党员交互项系数为负,与干部交互项系数为正但绝对值小于前者,这说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既是党员又是干部的人的子女随着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择校概率在下降<sup>④</sup>,但不显著。

当一个家庭的子女需要择校的时候,还有可能使用祖父辈的资源,我们将祖父的党员身份虚拟变量加入模型,考察政治资本优势的隔代作用是否存在。结果显示,祖父的党员身份显著地提高了择校概率。从直觉上来说,祖父一代的党员身份有更大概率与政治权力相关,当其孙辈需要择校的时候,政治资本优势的隔代作用是显著的<sup>⑤</sup>。

我们还控制了父母的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并认为父母的人力资本越高,子女的择校概率会越低,这很好解释:教育风气浓厚的家庭,其子女学习成绩好的可能性就越大,择校的需要就越小。回归结果中,父母受教育年限系数显著为正,似

① 这可以解释在未引入党龄时党员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只考虑党员身份可能会掩盖掉党员群体内部的政治资本差异。

②  $\log p/(1-p) = -.613 + 0.078 * 16 - 0.002 * 16^2$   $p = .53$

③ 感谢审稿人指出这点,这其实说明了党员身份所体现的政治资本的异质性。

④ 父母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可能通过影响子女的学业成绩间接影响择校结果,这两种因素共同影响了最终的择校结果,限于材料我们无法得到更为细致的答案。

⑤ 需要指出,祖父政治资本不一定直接作用于择校(考虑到前面对党龄的讨论以及现实背景),而是通过父母政治资本间接起到作用,我们需要更细致的处理来得到准确的估计。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乎说明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子女择校概率反而更高。但是这需要控制其他条件不变,我们发现样本中,党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系数为正反而增加了党员家庭在择校上的优势<sup>①</sup>。这还没有完全解释系数为正的结果,我们引入祖父的受教育年限,发现其系数是显著为负的,符合人力资本对择校影响的假设。祖父受教育程度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对系数估计存在着影响,在后面部分我们将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

与预期一致,父母的经济资本(家庭收入)同样显著地增加了子女择校的的概率。考虑到社会流动,我们发现父母的农转非经历显著降低了少子女择校的的概率<sup>②</sup>。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家庭的择校概率较低。独生子女的择校概率较低,并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可能是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投资相对较多,已经进入好学校的概率更大<sup>③</sup>。在地区分层上,县城与乡镇的择校情况相似,而相对县镇而言,地级市和省级市的家庭择校更多,一方面是后者拥有更多可以选择的学校,另一方地级市和省级市的家庭在社会经济背景上更多地处于优势地位,更有择校需求和择校能力。

进一步地,我们还通过利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得到的线性概率模型(LPM)和Probit模型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这三个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sup>④</sup>。

在前面我们提到没有严格区分受访人是父亲还是母亲样本,加入受访人性别变量后并不显著,为了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父亲样本和母亲样本进行分开的Logistic回归,表4中的Logit 5和Logit 6分别给出了父亲样本和母亲样本的结果。我们发现,母亲样本中模型的拟合程度更好。父亲的党员与干部身份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而母亲该系数并不显著,党员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正好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母亲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子女的影响机制较父亲更为明晰。同样地,父母受教育年限系数为正的原因在于党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

为了得到更稳健的结果,我们保留了“为了上更好的学校”的样本,回归结果见表4的Logit 7,父母的政治资本增加了子女为了上更好的学校而进行择校的的概率,但是在统计上都不显著。父母受教育年限及其与党员的交互项的系数都是显著的,我们发现,在控制了父母政治资本过后,党员家庭的子女随着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为了上更好的学校”而择校的的概率下降( $\log \text{odds} = .092 - .146 = -.054$ ),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人力资本降低择校概率的假设。政治资本优势和人力资本的隔代作用仍然是稳健的,

- ① 这是因为能否成为党员与受教育年限是相关的,这种相关性在父辈较祖父辈体现得更明显。感谢审稿人也指出了这一点。
- ② 一般来说,农转非有升学、参军、招工、转干、征地、家属随转等方式,每种方式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对子女择校的影响可能通过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两种途径,我们没有办法识别他们是否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通常来说能通过升学等方式进入城市的父母大多数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而降低择校概率。限于分析重点,本文对农转非的讨论较为笼统,社会流动对子女择校的影响是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 ③ 我们在Logit 7中选择了“为了去更好的学校”的样本进行回归,发现独生子女变量的系数尽管仍然为负(数值更小),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结论。
- ④ 根据Wooldridge(1999, 535-538)讨论的经验法则,Logit估计值除以4和Probit模型除以2.5后可以与LPM估计值进行比较。换算过后Logit和Probit的估计值都大于LPM估计值,但相差不大,这是因为LPM假定自变量的边际效应是常数,而Logit与Probit模型的偏效应递减。

祖父党员身份增加了择校概率,而祖父受教育年限降低了择校概率。

表 4 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概率的影响 (Logit Model 稳健性讨论)

	因变量: 是否择校		
	Logit 5 ( MLE)	Logit 6 ( MLE)	Logit 7 ( MLE)
父母党员(1 = 是)	1.093 .990	-5.921 ** 2.681	1.469 .931
父母党龄	.0016 .046	.665 *** .226	.035 .045
父母党龄平方	-.001 .001	-.024 *** .008	-.001 .001
父母党校培训(1 = 是)	.344 .261	.083 .383	.047 .257
家庭 2002 年收入对数	.112 .085	.162 * .089	.230 *** .079
父母受教育年限	.012 .035	.068 ** .031	.092 ** .031
祖父党员(1 = 是)	.204 .166	.519 *** .164	.367* *** .145
祖父受教育年限	-.021 .017	-.025 .019	-.038 ** .016
父母干部身份(1 = 是)	-1.368 1.712	-.980 2.811	-1.236 1.661
父母干部身份与党员交互项	1.369 ** .650	-.269 .857	.607 .550
父母干部身份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	.049 .125	.067 .199	.073 .117
父母党员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	-.107 .076	.159 .151	-.146 ** .071
其他控制变量	X	X	X
obs	1 171	1 208	2 128
df	18	18	18
LR chi2	32.41	70.98	71.06
拟 R <sup>2</sup>	0.0264	0.0599	0.0435

注: \*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常数项略去。控制变量包括: 独生子女、少数民族、父母农转非、受访人性别(仅 7) 以及地区分层虚拟变量。

祖父辈对父辈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隔代作用,可能使我们误估父母政治资本

对子女择校的影响 将其误归为祖父辈的直接影响。我们使用两种工具变量进行修正, Probit 2 使用祖父的党员身份作为父母党员身份的工具变量, Probit 3 使用祖父辈的受教育年限作为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相较而言, 前者是一个更好的工具变量<sup>①</sup>。

在 Probit 2 中, 我们将祖父的政治资本对择校的优势视作间接影响, 通过父母的政治资本优势起作用, 修正了估计误差后发现, 父母政治资本显著提高了子女择校的概率, 父母的人力资本则显著降低了子女择校的概率, 与前述的结论及推断相一致。Probit 3 提供了一个弱工具变量, 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但是相同的系数符号还是增加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5 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概率的影响 (Probit Model ,IV)

	因变量: 是否择校		
	Probit 1 (MLE)	Probit 2 (IV, MLE)	Probit 3 (IV, MLE)
父母党员(1 = 是)	-.085 .086	2.207 *** .431	.026 .100
家庭2002年收入对数	.084 ** .034	-.050 .045	.126 *** .042
父母受教育年限	.024 ** .012	-.038 ** .018	-.061 .044
父母干部身份	.067 .119	-1.000 *** .227	.198 .136
祖父党员(1 = 是)	.192 *** .066		.233 *** .071
祖父受教育年限	-.013* .007	.005 .007	
其他控制变量	X	X	X
obs	2405	2405	2405
df	13	12	12
LR chi2/Wald chi2	62.05	191.74	59.30
拟 R <sup>2</sup>	0.0254		

注: \*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常数项略去。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独生子女、少数民族、父母农转非、受访人性别以及地区分层虚拟变量。

在前一个部分, 我们采用了受访家庭第一次择校的数据进行讨论, 更一般地, 我们考虑多次择校的情况。在有过择校的家庭中, 大约有25%的家庭有过多次择校, 在这个部分我们考察父母政治资本有没有影响子女的择校次数。择校次数是一个计数变量, 只包括0在内的有限几个数值, 与线性回归模型相比, 一个更适合的模型是 Poisson 回

① 可能的原因在于两代之间, 党员的选拔机制的变动要远小于教育体制的变动, 导致父子两代受教育年限的相关性更弱。

归模型。结果与政治资本对择校概率的影响相似,其现实含义也是类似的。

我们还试图讨论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动机的影响,采用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 (MNL) 进行回归后发现结果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第4类(其他原因)所占比例过大,而“其他原因”的表述又是含混的,影响了分析结果。从统计分布的结果来看,从择校分布来看,党员家庭相对非党员家庭基于“为了上更好的学校”选择“重点中学”的比例更大。

## 五、政治资本与择校费支出

接下来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择校时的择校费支出是否受到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正如我们在假设部分所提出的,父母运用自己的政治资本(包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使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就读,而好学校的择校费通常是比较高的,尽管父母所拥有的政治资本可能会抵减一部分择校费(所谓的“递条子”),但总体来说对择校费支出的影响是无法确定的。

根据数据的特点,严格为正且大致连续,同时总体中有相当部分取值为0,我们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此时是一个上下删截的数据形式。我们采用第一次择校的择校费数据并调整到2002年不变价格,删截了择校费小于100元和大于30000元的数据。同时,我们引入了择校原因、阶段和类型的控制变量。

结果见表6,分别给出了 OLS 和 Tobit 模型的结果。父母政治资本变量均不显著,说明父母政治资本对择校费并没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了学校变量过后,党员的系数从正变为负,尽管统计上不显著,但也暗示着父母政治资本可能带来的择校费抵减。而父母干部身份的系数为正,这并不是说控制学校条件后,与低政治资本家庭相比,高政治资本的家庭反而支出了更多的择校费,而是说家庭政治资本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子女进入好学校的机会<sup>①</sup>。但从回归结果来看,父母政治资本对择校费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6 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费的影响(Linear Model, Tobit Model)

	因变量: 第一次择校费的对数			
	Linear 1 (OLS, robust)	Linear 2 (OLS, robust)	Tobit 1 (MLE)	Tobit 2 (MLE)
父母党员(1 = 是)	.081	-.386	.076	-.379
	.795	0.689	.826	.654
家庭2002年收入对数	.393 ***	.333 ***	.390 ***	.325 ***
	.077	.059	.074	.059

<sup>①</sup> 本文仅用科级及以上职务作为干部身份的刻画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干部在交纳择校费时的优势,通常认为即便是“递条子”也需要一定行政级别以上才能起到减少择校费的作用。这与笔者在西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县乡领导干部批条减少择校费、超生二胎抚养费的差序格局”的观察是一致的。

续表

	因变量: 第一次择校费的对数			
	Linear 1 ( OLS , robust)	Linear 2 ( OLS , robust)	Tobit 1 ( MLE)	Tobit 2 ( MLE)
父母受教育年限	.0003 .029	-.005 .024	.0003 .030	-.005 .024
祖父党员(1 = 是)	-.046 .144	-.028 .114	-.036 .136	-.017 .107
祖父受教育年限	-.010 .014	.011 .011	-.010 .014	.011 .011
父母干部身份(1 = 是)	2.232 2.098	2.233 1.618	2.175 2.116	2.139 1.668
父母干部身份与党员交互项	-.014 .499	.098 .385	-.006 .555	.106 .435
父母干部身份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	-.171 .149	-.183 .117	-.167 .153	-.176 .121
父母党员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	.016 .066	.035 .059	.016 .070	.034 .056
控制择校变量		X		X
其他控制变量	X	X	X	X
obs	475	475	475	475
uncensored obs			455	455
df	16	25	16	19
LR chi2			110.70	341.42
R <sup>2</sup> /拟 R <sup>2</sup>	0.2110	0.5133	0.0647	0.1996

注: \*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常数项略去。择校变量包括择校阶段(小学、初中和高中)、择校原因(未通过考试、上更好学校、父母工作调动和其他)、择校类型(重点学校、私立学校和普通学校)等虚拟变量。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独生子女、少数民族、父母农转非、受访人性别以及地区分层虚拟变量。

我们发现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 决定择校费的主要还是学校特征变量。在对择校费支出进行估计的时候, 不能忽略自我选择的偏差。自我选择问题来自于样本的非随机性, 通常样本是有意识地自我选择进入某个样本组的, 并且他们的选择又与需要估计的目标方程有关。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指出, 拥有更高政治资本以及其他资本的家庭, 有更大概率选择高收费的好学校, 由此产生自我选择问题。我们使用 Heckman 选择模型(Heckit Model) 解决自我选择偏差的问题<sup>①</sup>。

从供求模型的框架出发, 我们假定是家长根据家庭特征选择进入相应的学校, 而学

① 参见 Heckman(1974; 1976)。

校特征决定了择校费的大小。于是我们将家庭特征放入决策模型,而将学校特征放入回归模型。表7给出了 Heckit 模型的估计结果。逆米尔斯比率的检验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的,说明存在自我选择的偏差。 $\rho$  值小于 0,说明有选择性偏差模型的估计值偏小,比较 OLS 模型和 Heckit 模型的估计值,我们发现 Heckit 估计的系数值要更大。而在选择模型中,与前一部分的结果一致,父母政治资本对于子女择校的影响是显著的。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子女择校的时候,父母的政治资本帮助他们进入到了更好的学校。在解决了选择性偏差问题后估计值变大,说明拥有更高政治资本能够降低择校费支出。

表7 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费的影响(Heckit Model)

	因变量: 第一次择校费的对数	
	Linear Model ( OLS , robust)	Heckit Model ( MLE)
未通过升学考试而择校为对照项		
为了上更好的学校而择校	-.073	-.060
	.176	.182
父母工作调动而择校	-.115	.014
	.296	.447
其他原因而择校	-.780 ***	-.847 ***
	.178	.187
小学阶段为对照项		
初中阶段	.611 ***	.732 ***
	.134	.133
高中阶段	1.093 ***	1.110 ***
	.146	.147
重点学校为对照项		
私立学校	.247	.283
	0.215	.210
普通学校	-.615 ***	-.502 ***
	.186	.127
乡镇为对照项		
县城	.088	-.086
	.201	.186
地级市	.679 ***	.482 ***
	.193	.182
省级市	1.169 ***	.892 ***
	.182	.176

续表

因变量: 第一次择校费的对数		
	Linear Model ( OLS , robust)	Heckit Model ( MLE)
选择方程		
父母党员(1 = 是)		.447
		.472
父母党龄		.030
		.023
父母党龄平方		-.001
		.001
家庭2002年收入对数		.125***
		.034
父母受教育年限		.032**
		.013
祖父党员(1 = 是)		.138**
		.069
祖父受教育年限		-.014*
		.007
父母干部身份(1 = 是)		-.225
		.847
父母干部身份与党员交互项		.537*
		.276
父母干部身份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		-.001
		.062
父母党员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		-.066*
		.036
其他控制变量		X
Mills Lambda		-.885**
		.375
rho		-.663
obs	506	2359
uncensored obs		428
df	10	10
Wald chi2		359.82
R <sup>2</sup>	0.4541	

注: \* 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常数项略去。选择方程中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独生子女、少数民族、父母农转非、受访人性别虚拟变量。

## 六、政治资本与公共教育态度

我们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家长运用政治资本使得子女进入好学校就读,那么他们对于公共教育的态度会是怎样?换言之,当强势家庭的子女进入到重点学校就读后,这些家长对普通学校的公共支出会持有消极态度吗?在CGSS 2003的问卷中有对家长政治态度的访谈,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只要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受访人在“同意、不知道、不同意”之间作答(分别赋值为1、2、3),这个问题实际上类似于“以分数择校”的判断,相较于“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来说,“以分数择校”是一种较为公平的教育机会和资源分配方式。

从党员身份与教育态度的描述统计结果来看,党员中选择不同意的比例(22%)要略高于非党员(19%),卡方检验( $p=0.002$ )认为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公共教育态度有显著不同。看起来党员更倾向于精英主义,而非党员则更看重大众主义。出现这样的分歧是正常的,Grossman and Kim(2003)讨论了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会在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中作出不同的选择,他们认为精英们面临的两种选择就是:或者通过公共教育使人力资本在社会中的分配更加平均,从而使贫穷者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而制止其劫掠倾向;或者维持人力资本集中在精英手中的格局,同时加大防备贫穷者劫掠的支出。当然,描述统计的分析是粗略的,还需要我们控制其他变量做进一步的分析。同时,我们还发现择校家庭的受访人选择同意的比例(77%)略高于未择校家庭(76%),但差异并不显著。

在处理相对次序因变量数据的时候,一般采用定序因变量模型(Ordinal Logit)。我们主要引入父母的政治特征变量,祖父和配偶的党员身份以及子女是否择校的虚拟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并考虑地区分层的影响。表8给出了回归结果,由于1表示“同意”,3表示“不同意”,系数为负代表倾向公平的公共教育态度。

表8 政治资本对公共教育态度的影响(Ordinal Logit Model)

	因变量: 公共教育态度		
	Ordinal Logit 1 (MLE)	Ordinal Logit 2 (MLE)	Ordinal Logit 3 (MLE)
受访人党员(1 = 是)	.647 *** .221	-.176 0.787	-.191 .788
配偶党员(1 = 是)	-.101 .136	-0.098 .136	-.096 .136
受访人党龄	-.036 *** .011	-.033 *** .012	-.033 *** .012
受访人参加过党校培训(1 = 是)	.214 .196	.204 .200	.202 .200

续表

	因变量: 公共教育态度		
	Ordinal Logit 1 ( MLE)	Ordinal Logit 2 ( MLE)	Ordinal Logit 3 ( MLE)
家庭 2002 年收入对数	-.032	-.026	-.024
	.058	.059	.059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	.028	.033	.034
	.020	.022	.022
受访者父亲党员(1 = 是)	-.253 **	-.250 **	-.246 **
	.117	.117	.117
受访者父亲受教育年限	.023 *	.022 *	.022 *
	.012	.012	.012
受访者干部身份(1 = 是)		3.438 ***	3.413 ***
		1.280	1.283
受访者干部身份与党员交互项		.285	.282
		.479	.482
受访者干部身份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		-.293 ***	-.294 ***
		.101	.102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与党员交互项		.066	.065
		.061	.061
受访者子女择校			-.188
			.255
受访者子女择校费			.006
			.032
受访者党员与子女择校交互项			.118
			.346
受访者干部身份与子女择校交互项			.113
			.494
控制其他变量	X	X	X
obs	2 322	2 322	2 322
df	15	19	23
LR chi2	41.92	51.42	52.39
拟 R <sup>2</sup>	0.0141	0.0172	0.0176

注: \*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截距项略去。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独生子女、少数民族、父母农转非、受访人性别虚拟变量。

结果显示, 党员并没有比非党员更倾向于认同精英化的教育机会分配, 党员身份为负, 但不显著。一个有趣的发现是, 配偶党员和父亲党员的系数均为负, 这说明如果自己的父亲和配偶也是党员的话, 认同公平的公共教育机会的概率会更大。党龄的系数

与父亲党员的系数都显著为负,共同佐证了老党员更认同公平的教育机会分配的推断。

然而与党员相比,具有干部身份的受访者则显著地倾向精英教育机会分配,同样地,参加过党校培训的受访人的系数同样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具有党员和干部身份的受访者的态度发生改变。非党员、非干部的受访者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正,尽管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体制之外的人接受了更高的教育,反而越来越可能不认为“只要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

我们还控制了受访人子女择校的情况。子女是否择校对受访人的公共教育态度没有显著的影响,其系数为负,说明已经有择校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更希望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当然这种态度随着缴纳的择校费的增加而发生改变。而子女择校与受访人的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的交互项均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

尽管结果拥有更高政治资本(尤其是干部与非干部相比)的人具有更消极的公共教育态度,但是控制了择校变量后发现,在中国,拥有更高政治资本并用于子女择校的父母并没有对公共教育持显著的消极态度。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暗示的情形是,拥有更高政治资本的人已经将子女安排在好学校就读,并不需要重新择校。面临对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家长将自身所拥有政治资本或者其他资本用于择校竞争,家长“以权择校”以及“以钱择校”的行为,并没有影响他们对教育公平的基本判断。

在我国,好学校首要的录取条件是分数,在分数不够的情况下,以钱择校或以权择校才会发生。受材料限制,我们无法观测到择校之前的情况,也无法观测到那些没有择校的家庭的情况,强势家庭的子女有可能一开始就进入了好学校,无须再进行择校了,这样我们有可能低估政治资本在子女入学上的作用(影响成绩和直接影响入学两种机制)。

如今政府解决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过度分层带来的择校问题的主要思路是推进公办教育的均衡发展和禁止公办学校招收择校生,当越来越多强势家庭的子女进入到好学校的时候,旨在提高“差学校”办学水平的公共教育均衡工程是否会遇到阻力;或者说,当更多人进入好学校的需求在民办学校、“公办民助”学校得到满足的时候,公办学校的改革和发展该如何进行,这都需要我们接下来更深入地讨论。

## 七、小 结

本文利用 CGSS 2003 的数据对我国城镇地区“以权择校”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将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作为政治资本的代理,通过多种恰当的计量手段考察父母的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的影响。

我们首先使用 Logit 模型分析了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概率的影响,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父母的政治资本对子女的择校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地,我们将党员身份视作具有政治资本的社会网络作用,将干部身份视作具有政治资本的政治权力作用,结果发现,具有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的父母,其子女有更大的概率去择校。同时,引入党龄和党龄的平方项发现,党员身份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党龄的作用类似于人力资本理论中工龄的作用。祖父辈的政治资本也显著地增加了孙辈的择校概

率,可以视作是政治资本隔代作用的证据。

多种稳健性讨论验证了我们的结论。进一步地,为了得到祖父辈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更准确的估计,我们使用祖父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父母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工具变量,修正了估计误差后发现,父母的政治资本显著提高了子女择校的概率,父母的人力资本则显著降低了子女择校的概率<sup>①</sup>。

随后我们考察了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费的影响,我们在 OLS 和 Tobit 模型中没有发现父母政治资本的显著效果,这可能是样本自我选择的偏差,父母的政治资本帮助子女进入到了更好的学校,而好学校的择校费通常更高。我们使用 Heckman 选择模型进行修正,发现更高的政治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子女的择校费支出,

最后,我们使用 Ordinal Logit 模型估计了父母的政治资本对其公共教育态度的影响,拥有更高政治资本(尤其是干部)的人具有更消极的公共教育态度;控制了择校变量后发现,拥有更高政治资本并用于子女择校的父母并没有对公共教育持显著的消极态度。

本文的分析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将“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相割裂,事实上,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一座难求”,如今更多出现的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相组合的“权钱择校”,政治资本如何同另外的资本相联系,本文的分析并不深入。如同周群力和陆铭(2009)的思路,如今政治资本越来越被社会关系网所吸纳,因而越来越隐蔽,只是使用党员身份和科级以上干部身份作为政治资本的代理显得笼统,但受数据限制又难找到更好的代理变量。

我们对择校问题的研究是基于教育与收入的正相关假设的理论基础的,即接受更好的教育带来更高的收入,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学校投入与学生成绩有关系吗?迄今没有文献能够稳健地回答这个问题。在实证研究上,我们需要更细致的研究设计和方法去估计学校投入与学生成绩的关系,相关,或者因果?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择校是提高学生成绩,还是仅仅只是教育作为劳动力市场“前筛选”手段,或者学校投入与学生成绩乃至劳动力市场表现没有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甚至也有助于我们去回答“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钱民辉 2004; Zhou 2004; 吴晓刚 2009) 毕竟教育给了受教育者关于社会地位获得的某种预期,如果具有更高政治资本的家庭的子女通过不公平的分配机制获取了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如果教育“成为了一种排斥下层向上流动的手段的话,在整个市场转型过程中受益的仍然是旧体制的精英”(Li 2003)。

## 参 考 文 献

- Acermoglu, D. and J. Robinson, 2000,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1167-1199.
- Hsieh, C. and M. Urquiola, 2003, “When Schools Compete, How Do They Compete? An Assessment of Chile’s Nationwide School Voucher Program”,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Vol. w10008.

① 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种政治资本隔代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分析。

- Deacon, R. T., 2003,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Departmental Working Paper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C Santa Barbara.
- Glewwe, P., 1997,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Peer Group Effects on Socioeconomic Outcomes: Does the Distribution of Peer Group Characteristics Matter?",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16(1): 39-43.
- Grossman, H. I. and M. Kim, 2003, "Educational Policy: Egalitarian or Elitist?", *Economics & Politics*, 15(3): 225-246.
- Heckman, J. J., 1974, "Shadow Prices, Market Wages and Labor Supply", *Econometrica*, 42(4): 679-694.
- Heckman, J. J., 1976, "The Common Structure of Statistical Models of Truncation, Sample Selection,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a Simple Estimator for Such Models", *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5(4): 475-492.
- Hoxby, C. M., 2003, "The Economics of School Cho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vin, H. M., 2001, "School Choice: Market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Eds. by M. Carnoy,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 Li, B. and A. Walder, 2001,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 1949-199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5): 1371-1408.
- Li, H., 2008, "Three Essays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Ph. 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 Li, H., P. Liu, N. Ma and J. Zhang, 2007, "Economic Returns to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ese Twins", *Economic Journal*, 117(553): 1504-1520.
- Li, L., 2003,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s in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Dual Reproduction of the Pattern of Relative Inter-strata Relation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3-9.
- Liu, Z., 2003, "The Economics Impact and Determinants of Investment in Human and Political Capital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1(4): 823-849.
- Morduch, J. and T. Sicular, 2000, "Politics,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Does It Pay to Join the Par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7(3): 331-356.
- Nee, V.,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 663-681.
- Nee, V.,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908-949.
- Wooldridge, J. M., 1999,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 iXie, Y. and E. Hannum, 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950-992.
- Zhou, X., 2004,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边燕杰、吴晓刚和李路路 2008,《社会分层与流动: 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引言: 述评与展望》,载边燕杰、吴晓刚和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 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30页。
- 李芳 2008,《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现状分析》,《教育科学研究》第2期 26—30页。
- 李爽、陆铭和佐藤宏 2008,《权势的价值: 党员身份与社会网络的回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是否不同》,《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23—39页。
- 刘泽云 2007,《美国学校选择研究的最新进展与经验——〈学校选择的经济学分析〉评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 180—187页。
- 刘和旺和王宇锋 2010,《政治资本的收益随市场化进程增加还是减少》,《经济学(季刊)》第3期 891—908页。
- 李煜 2008,《婚姻的教育匹配: 50年来的变迁》,《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73—79页。
- 陈钊、陆铭和佐藤宏 2009,《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 ——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经济研究》第10期 121—132页。

- 罗凯和周黎安 2010,《子女出生顺序和性别差异对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一个基于家庭经济学视角的分析》,《经济科学》第3期 107—119页。
- 钱民辉 2004,《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 194—200页。
- 王丽和王善迈 2005,《义务教育中择校寻租主体的行为分析》,《教育科学》第6期 5—9页。
- 文东茅 2006,《我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及其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2期 12—23页。
- 吴晓刚 2009,《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社会》第5期 88—113页。
- 杨东平 2009,《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治理“择校热”的建议》,21世纪教育研究院政策报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471c80100evfk.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471c80100evfk.html) 2012-6-10访问。
- 杨钊 2009,《“三限”政策对公立高中择校的影响》,《教育发展研究》第19期 36—40页。
- 杨瑞龙、王宇峰和刘和旺 2010,《父亲政治身份、政治关系和子女收入》,《经济学(季刊)》第3期 871—890页。
- 张爽、陆铭和章元 2007,《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2期 539—560页。
- 钟奉和樊雪志 2007,《基础教育阶段城镇学生择校行为的实证研究》,《教育科学研究》第5期 47—49页。
- 周群力和陆铭 2009,《拜年与择校》,《世界经济文汇》第6期 19—34页。
- 周群力 2010,《拜年与择校》,复旦大学硕士论文。